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8 期（总第 304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15 年 8 月 5 日

-
- ◆ 守住农业安全底线.....万宝瑞（1）
 - ◆ 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揭益寿（5）
 - ◆ 永远铭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林 干（9）
 - ◆ 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危机初探.....孙万鹏（14）
 - ◆ 一项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改革.....郭书田（20）
 - ◆ 学习贯彻“四个全面”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丁玉华（22）
 - ◆ 供销社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打掉官风.....卢 文（25）
 - ◆ 我国“丝路战略”的思考与展望.....孙万鹏（30）
 - ◆ 先进县中的困惑.....郭书田（35）
 - ◆ 参观郑各庄村“主动城镇化”发展的印象.....丁玉华（37）
 - ◆ 弘扬“内圣外王”之道.....卢继传（41）

守住农业安全底线

——学习贯彻 2015 年中央 1 号文件精神

万宝瑞

今年的中央 1 号文件全面分析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解决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大课题，应对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大挑战，作出了全面部署。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农业产业安全、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凸显，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问题。贯彻落实中央 1 号文件精神，解决和应对好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课题与挑战，必须守住农业安全底线。

农业产业安全面临新挑战

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农业效益。但近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持续攀升，国内粮棉油糖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对提高农业效益、维护农业产业安全带来新挑战。

大宗农产品国内外价差不断扩大。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保护等成本不断提高，我国农业成本快速上升。2006—2012 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籽、甘蔗价格年均涨幅均低于同期成本涨幅，到 2013 年我国大宗农产品国内价格已全面高于国际价格。2014 年前 5 个月，大米、小麦、玉米、大豆、棉花、食糖国内外价差分别为每吨 318 元、451 元、924 元、1484 元、7078 元、2766 元。

关税的防火墙作用受到削弱。近年来，主要农产品进口税后价低于国内最低保护价和临时收储价，关税的防火墙作用受到削弱。这导致边收储边进口，政策成本过高。2013—2014 年度我国临时收储玉米 6919 万吨，临储棉花 629 万吨，每吨棉花库存 1 年的利息和维护成本在 2000 元左右。临储菜籽油高达 600 万吨，若按当前市场价格销售，价差损失超过 150 亿元。食糖临储库存累计 500 万吨左右，盈亏估计超过 200 亿元。

进口对国内农业产业影响加深。受价差驱动，我国主要农产品进口激增。“大豆之殇”是我国农业产业安全问题的典型表现。我国大豆种植户均面积小，难有规模效益，生产成本比美国高 30% 以上。由于大豆市场高度开放，国内大豆种植比较

效益低，导致大豆种植面积不断减少。食糖进口价格过低，导致国内价格持续下跌，造成糖企全面亏损、蔗农收入下降。国内外价差不断扩大，是造成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根本原因。

粮食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受到威胁。虽然当前我国粮食进口量并不大，但由于进口受国内外价差驱动，国内粮食产业发展受到威胁。2013 年，越南籼米价格低廉，国内企业进口动力强劲，造成南方籼稻库存积压、销售困难。玉米国内供给和库存充裕，但仍然保持一定数量的净进口。在国内粮食连年增产、库容紧张的情况下，进口激增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卖粮难”局面。

粮食安全面临新挑战

中央 1 号文件把“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作为第一条，凸显了确保粮食安全、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的重要性。尽管我国粮食产量十一连增、产能达 6 亿多吨且库存充足，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农业开放度提高，我国粮食安全面临新挑战。

增产潜力减弱，保持产能难度加大。2003—2014 年的粮食十一连增实际是波动型的微增。11 年间，不同年份增产幅度差异较大，最高增幅是 2004 年的 9%，最低是 2009 年的 0.4%，且近 4 年有逐年减小趋势，在高基数上继续增产难度越来越大。我国粮食发展纲要要求到 2020 年粮食产能达 5.5 亿吨以上，尽管 2013 年粮食产量已超过该目标，但受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自然灾害和资源环境制约，在农业科技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保持现有粮食产能难度加大。

生产成本快速上升，粮食价格提升空间减小。据测算，从 1995 年到 2011 年，我国 3 种谷物和大豆每亩产出量分别增长 29.1%和 32.8%，但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期每亩总成本分别增长 110.2%和 91.8%，收益率都明显下降。直接生产成本上升是推动农业生产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力量，包括化肥、农药、农膜、机械作业、劳动力等，这些投入占总成本的 80%以上，而且近几年仍在上升。粮食价格缺乏高关税保护，难以相应上涨，这就使粮食生产缺乏必要的利益激励。

进口快速增长，粮食安全战略受到挑战。自 2009 年我国谷物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以来，进口量一路激增。尽管目前我国三大谷物进口量保持在关税配额之内，但按目前生产成本和价格增长趋势推算，今后 5—7 年三大谷物以配额外关税税率进口将成为现实。我国对于征收配额外关税后的进口是完全放开的，这将给“以我为主”和“适度进口”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带来挑战。

种粮比较效益低，流转土地“非粮化”较为普遍。2011 年，种植苹果、蔬菜、花生的每亩净利润分别为 4612 元、2558 元、723 元，而种植 3 种主粮的平均收益只有 251 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接手流转土地后“非粮化”现象较为突出。截至 2012 年底，全国流转后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面积为 1.56 亿亩，占总流转面积的 56%。截至 2013 年底，有些种粮大省土地流转后“非粮”比例增加了 20%—30%。

农产品质量安全面临新挑战

调查显示，目前城市居民感到最不放心、最不安全的社会问题是食品药品安全。因此，中央 1 号文件专门部署“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因素多。一是农业生产环境影响。据专家估算，我国粮食生产每年因重金属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200 亿元，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难以保障。二是农业生产技术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非科学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等现象屡见不鲜。三是经营方式及市场影响。我国有 2.5 亿农户和约 50 万个农产品加工企业，组织化程度较低，分散经营的模式很难实行标准化生产，在利益驱动下农产品质量控制往往被忽视。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难度大。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物链条中，种、养、收以及初加工等环节是决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相对于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更加难以控制。一方面，化肥、饲料、农药、兽药等各类投入品使用的技术千差万别，生产经营者众多，农产品种类繁多，难以全面监管。另一方面，农产品中微生物、重金属、兽药和农药残留等有害物指标，以目前的检测技术，再考虑成本等因素，难以全面检测。

确保我国农业安全的对策

农业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必须按照中央 1 号文件提出的“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总要求，从战略高度积极应对。

完善农业产业安全战略。在涉农国际贸易谈判中坚持粮棉油糖关税税率不减让、关税配额不扩大、农业“黄箱”支持空间不削减。加强产业损害预警，积极利用“两反一保”措施，使贸易救济常态化。研究建立农业产业损害补偿机制，加强对国内产业的贸易补偿，对因进口农产品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农业产业和农民提供补偿性援助。

实施差别化的粮食安全战略。根据“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要求，区分口粮、工业用粮和饲料粮的不同需求特点，明确国内必须保有的基本面积和基本产量，确定农业支持优先重点。合理确定粮食进口预警阈值，运用有效手段把握进口时机和节奏，确保进口规模适度适当。

强化农业支持战略。一是完善财政支农长效机制。探索“普惠制”与“特惠制”相结合的财政支农政策，使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得到更多补贴。逐步扩大“绿箱”支持政策，调整改进“黄箱”支持政策。二是明确金融部门支农责任。明确金融机构在支持农业和服务粮食安全方面的责任。加大国家对涉农贷款的补贴支持力度。三是明确大型涉农企业粮食安全方面的保障责任。对经营大宗农产品且达到一定市场份额的大型企业，实行强制性信息报告制度和库存储备制度，规定规模以上粮油经销企业必须建立相应规模的粮食安全储备库存，明确其在粮食安全方面的法定保障责任。

推进农业“走出去”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完善农业“走出去”政策支持体系，加强组织和监管。一是抓住重点环节，突出重点领域，主攻周边国家，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二是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进口渠道，充分利用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把握好农产品进口规模和节奏，稳定进口来源。三是把农业“走出去”与市场多元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提升“走出去”对象国的生产能力，为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进口渠道夯实基础。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市场交易，争取掌握粮食价格国际话语权。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战略。一是加强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明确农业部门在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测、监督、认证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强化农业部门对违法违规农产品的处罚管理。二是加快农业标准化步伐。加大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区、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养殖小区、示范农场、出口产品及原料基地建设力度，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加强农民教育培训，提高农业管理者和农产品生产者素质。三是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技术的应用，实行优质农产品标签制。

（作者系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

※ 践行三严三实，服务农业生产 ※

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

——2014 年工作总结和 2015 年工作初步安排的报告

揭益寿

我受河南省农促会领导的委托，代表农促会向会议作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 2014 年工作总结和 2015 年工作初步安排的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部分知名专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部署，深入研究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工作已有近 40 年的历史。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完全符合党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的指示精神，而且在绿色循环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方面成果显著。为了总结河南省 2014 年建设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工作和安排 2015 年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4 年示范园示范基地建设进展情况

1、新型现代农业（绿色循环）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专题论述生态文明，并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来论述，表明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

发展新型现代农业（绿色循环）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人口、资源、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实现科教兴农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途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新型现代农业（绿色循环）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可以树立绿色农业、循环农业、有机生产、有机消费的发展理念，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同时，要发挥龙头企业集群集聚优势和家庭农场、种田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示范作用，强化产业化功能，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同步发展。此外，发展新型现代农业（绿色循环），既可以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又能够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构建和谐社会和维护公众健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的由来

经国家农业建设方面的老领导、老专家提议并征得河南省发改委同意，遵照党的十八大和《中国农业发展模式创新与农业现代化》一书的先进理念，在河南省境内建设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示范基地进行先行先试和取得示范经验，逐步推广的要求，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会经过选址并与地方政府签署共建合作协议，由河南省农促会三农理论与实践研究室具体负责合作共建的指导工作。

3、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工作进展情况

河南省农促会用两年时间完成了选址、编制总体规划、项目建议书、成立专家咨询指导委员会和园区建设的准备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专家咨询指导委员会在38家选址工作中已选定的示范园区示范基地有：中牟县官渡镇新型现代农业（绿色循环）示范园（以蔬菜种植为主）、淅川县绿色循环现代农业示范园（以香根草、百喜草栽培、加工利用、水土保持为主）、河南省禹州市新型现代农业（绿色循环）示范园（以高标准粮田、果树为主）、温县邢邱黄河白鹅标准化养殖和铁棍山药种植及深加工示范基地、河南省杞县新型现代农业大蒜辣椒种植及深加工项目示范基地、河南省兴农农民专业合作社长垣县、滑县分社新型现代农业（绿色循环）高标准粮田种植示范基地、原阳县沃源米业有限公司新型现代农业（绿色循环）高标准粮田种植及深加工建设项目示范基地，三个园、四个示范基地共七处。

另外，河南省社旗县大冯营镇、鲁山县、河南濮阳水博园游览区发展有限公司、商水县金昌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叶县、开封田园大丰农民种植合作社、获嘉县为河南省农促会的新型现代农业（绿色循环）示范园区、示范基地试点联系单位。

截至2014年10月底，上述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全部考察指导完毕。通过考察我们对示范园区的发展情况及存在问题有了全面的了解，并针对示范园区示范基地提出的意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指导。为示范园区示范基地今后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4、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取得的初步成果

通过对示范园区、示范基地的考察指导，针对示范园区、示范基地目前的状况

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咨询指导意见，为示范园区、示范基地继续走既全程绿色生产又全程绿色循环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初步化解了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推动了示范园区的发展。同时将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成果上报到了河南省发改委和省农业厅。

河南省农促会专家咨询指导委员会、三农理论与实践研究室和民盟河南省委课题组 2014 年工作实践证明，为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全心全意地服务是根本，一年来专家委员会为示范园区、示范基地进行了现代农业科技服务，管理服务、培训服务、发现矛盾、化解矛盾，起到了专家智库作用，并且给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引进了高科技有机肥——聚谷氨酸的推广。特别是聚谷氨酸在温县铁棍山药和地黄中草药种植产业上推广使用，效果良好，在今年大旱的情况下铁棍山药不仅没有减产，反而每亩增产 500 斤，而且提高了铁棍山药的品质；特别是河南省农促会协助台湾生产聚谷氨酸的企业将产品推广到黑龙江、吉林、内蒙、新疆等省（自治区），取得重大突破，成果显著。在高标准粮田建设方面和生产优质、高产、生态、营养、安全农产品方面也取得了较好成绩。

5、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上述示范园、示范基地建设单位均已初步完成组织建设、规划编制和骨干人员培训工作，当地农民对新型现代农业的认识基本到位，农业新技术正在逐步有序推广，有的已经完成了土地流转过程，有的还在进行中。但是经考察，也发现不少实际困难和问题，比如农业基础设施薄弱，资金短缺、部分农民不愿土地流转、合作社运作模式缺乏统一规范、缺乏管理人才、营销人才、技术型人才、服务体系不到位，对两年制管理人员培训，个别单位领导人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自己不学也不认真组织员工学习等困难和问题。

二、2015 年工作安排

- 1、2015 年第一季度召开示范园示范基地工作会议（即今天的会议）；
- 2、继续办好示范园区示范基地两年制管理人员培训班；
- 3、2015 年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聚谷氨酸等高科技农业生产资料的推广使用，推动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农作物增产、增收；
- 4、土地流转和发展现代农业股份制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田大户、家庭农场有进展和体制机制创新有突破；
- 5、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应按批准的规划、项目建议书进行

全面建设;

6、争取国家对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示范基地给予必要的人才、资金与技术支持和大力推动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进行绿色资金与技术引进;

7、根据 2014 年秋季种植的 313 亩优质、高产小麦示范基地计划,在 2015 年麦收季节召开小麦优质、高产现场会;

8、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向“十化”和“八节一降一减一低二提高加循环”方面发展并有明显推进;

9、组建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农产品物流企业,实现占领市场、创出品牌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

10、2015 年 4 季度召开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经验交流会和组织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到先进农业典型单位学习考察;

11、进行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推动示范园区、基地产品生产实现优质、高产、生态、营养、安全的目标;

12、各示范园区、基地大力进行诚信道德建设和产品品牌建设,实现为农民服务、为农业现代化服务而努力奋斗!

三、图书出版工作

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是以《中国农业发展模式创新与农业现代化》一书理论为指导的,通过这几年的实践,证明此专著理论与实践是正确的,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建设必须以此专著为指导。但为了使该书更全面、系统和更具有可操作性,计划 2015 年对此书再次进行全面修订出版,其中经验介绍部分,优选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先进典型写入此专著,同时,此书这次修订重点是对该书中的实际操作部分进行系统全面修改,如:“八节一降一减一低二提高加循环”和农业“十化”等内容进行补充。

四、新型现代农业前景展望

前途光明 方向正确 前景广阔;

道路曲折 矛盾很多 困难极大;

开拓创新 科学态度 求真务实;

科学管理 依靠专家 依靠群众;

标准认证 冲破壁垒 走向世界;

生态教育 科技培训 提高素质；
动态监测 改善环境 碧水蓝天；
团结协作 持续发展 锲而不舍；
统筹协调 生态文明 全面小康。

（作者系河南省农促会研究室首席专家）

永远铭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林 干

一、日本侵略者罪行滔天，罄竹难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中国从十四世纪开始的 300 多年中，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 1/3，国家繁荣昌盛，使人民过上好日子，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些老牌帝国主义，不甘心中国的兴旺发达，看上这块沃土垂涎三尺，终于坚船利炮向中国开战，1840—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 年的甲午战争，1900 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这些强加给中国人民头上的侵略战争，所到之处被侵略战争洗劫，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规模空前。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压迫、剥削，使国家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日本从明治维新走上称霸亚洲和世界的野心道路，中日是一衣带水，看上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中国是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而日本只有 37.7 万平方公里），从 1931 年“九一八”侵占了东北地区，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侵占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再到 1945 年日本投降，中国军民经过了 14 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也是从 1840 年以来到 1945 年 100 多年来中国人打败外国侵略者第一次胜仗。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作恶多端、残忍至极，野蛮残暴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用禽兽不如等各种词汇都无法形容他们那种实际邪恶程度，日军所到之处实行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最后竟疯狂的到杀人比赛，杀人取乐，练兵打靶时则用抓来的活人作靶子，臭名昭著的日本 731 部队甚至用抓来

的活人作实验，丧心病狂到了何等的地步。

我老家是山东省文登县（现为文登市），是生我、养我、读书、参加革命工作，也是参加抗日战争进行活动的沃土。当时这个县有 50 万人口，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县，也是一个长寿之乡。在胶东地区人称西有蓬黄掖（即蓬莱、黄县、掖县）东有文荣威（即文登、荣成、威海）。从 1940 年到 1944 年被日本侵略者掠占了 5 年之久，把一个好端端的文登县糟蹋的不成样子，日本侵略者在县内一些重要集镇交通要道先后建立了 20 个据点，隔三差五大股小股到农村扫荡，杀人抓人抢掠、烧房子，制造了大大小小惨案达数起之多，景况惨不忍睹，老百姓吃不好、睡不好、生产不好，极度恐惧，民不聊生。根据 1938—1944 年统计资料显示日本侵略者这一时期在文登县杀害无辜群众达 1139 人，致残 332 人，捕抓 2776 人，强征劳役工 2236986 个，抢粮 2791701 公斤，抢酒 18802 公斤，抢钱 2.3 亿元（北海币）、抢大牲畜 45891 头，猪羊等 6680 头，鸡鸭 95129 只，抢劫柴草 58841 公斤，木材 3117863 方寸，抢劫衣服、被褥等 3493424 件，抢劫黄金 4982.9 两，白银 1974 公斤，钢铁 22.5 万公斤，烧毁房屋 15330 间。1940 年 2 月日军在文登城设立“大阪俱乐部”，把抓来的妇女强制为妓，专供日军官兵淫乐。1940 年 2 月至 1944 年 9 月我方与日军作战 240 次，牺牲 699 人。

日本侵略者在文登县制造的数起惨案，值得一提的是 1938 年 3 月葛家惨案，1940 年 2 月下徐村惨，1941 年 5 月 23 日南马惨案，1941 年 8 月 25 日营南惨案都十分惨烈。这里列举营南惨案最为惨烈，惨遭日军杀害的无辜群众 120 人，烧毁房子 1003 间，损失其他物资 5504234 元（北海币）。日军在营南用 3 挺机枪同时扫射抓来的 100 余名群众，全部应声倒下，陈桂序家里 5 名年轻妇女，遭一群日军轮奸，一个 19 岁姑娘被轮奸后，惨死于刺刀下，一个姑娘左腿被打断，在血泊中呻吟，一名日军用刺刀挑开衣襟，割下乳房，扒出心肝，踢进沟内。一个四岁的女孩爬在妈妈尸体上哭叫，日军抓起孩子两腿劈成两半，丢进壕沟里。这些惨案每次都伴随着烧杀抢掠屠杀手无寸铁无辜群众，令人发指，天理难容，血债要用血偿还，日本侵略者必将以失败告终。

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具有世界意义

在近代 100 年间，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列强都侵略过中国，但中华民族在抵御外国的侵略战争中，几乎没有取得一场真正的胜利，由于屡战屡败，每次都要签订不平等条约，都要割地赔款，使中国山河破碎，民众饱受极大的痛苦。但抗日战争

则不同以往，第一次是中国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再也不用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和赔款，丧权辱国的那种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正是这个重要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抗战、实现民族政治、改善人民生活三项主张，并向全国声明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个番号是 115 师、120 师、129 师，合作抗日共赴国难，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日战争任务进行到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将在延安部队东进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1940 年 8 月 20 日至 12 月 15 日八路军在华北地区投入了 105 个团 40 万兵力发起了空前的百团大战。1938 年 3 月 14 日—4 月 15 日，国民党军队约 29 万兵力与日军台儿庄大战，这两次大战取得了绝对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信心，打破日军妄想在三个月内结束侵华图谋不可战胜的神话。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台儿庄捷报传出，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进行重要战役达 200 多次，大小战斗近 20 万次。在敌后战场，对敌作战 12.5 万次，消灭日伪军 171.4 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 130 余万人，建立了约 100 万平方公里近 1 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坚力量。在战略战术上实施毛泽东主席持久战的方针，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抗日战争中极大地焕发全民的救国精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将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凝聚和组织起来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旅居海外华侨 800 万，为支援抗战不遗余力，粤籍华侨和台湾同胞 9 万多人回国，以各种形式投入到抗战中，广大人民踊跃参与，全民皆兵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国的抗战打破了日本侵略者的速战速决的幻想，令其陷于持久的泥潭，中国战场始终迫使日本在中国保持一支大约 100 万人的军队，被中国牵制既不能北进到苏联开战，又不能南进去侵略东南亚地区。抗战使日本称霸亚洲的战略失败，以日本为主东西方秩序无法建立，抗战还帮助结束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中国军民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 3500 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 1000 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 5000 多亿美元。中国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绵延 14 年中国人民的民

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在这里还要提及文登县的八年抗战。“七七”事变后的 1937 年 8 月日寇则大举进犯山东，胶东地区有 20 几个县，几乎全部侵占。中共胶东特委于 1937 年 12 月 24 日在文登县天福山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组织人民武装，坚持抗日，打击日本侵略者。三军成立后即奔赴蓬黄掖三县，路经牟平县于 1938 年 2 月 13 日在雷神庙重创日军，三军指战员迎击数倍于己的日军，经过 8 小时的激战，毙伤日伪军 50 多人，打响了胶东的第一枪，打破日本鬼子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人民的抗日信心。在八年抗战中文登籍的人民子弟兵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奔赴前线与敌人战斗牺牲的烈士有名有姓的就达 2137 人。文登人民不信邪，千方百计打击日本侵略者，发展地方武装，父子送子，妻子送丈夫，踊跃参军十分感动。建立乡间民兵组织，劳武结合，一手拿枪一手拿镰刀锄头，把所有的主干道挖沟，土方筑高，不使敌军车辆马队通行，实行坚壁清野，把粮食放在村外隐藏，防止日军进村抢粮，埋设地雷爆破，对日军据点夜间进行骚扰声东击西重点突破，对敌加强政治攻势，严密监督伪保甲长，对日军小股下乡扫荡采取伏击战、地雷战、游击战方法歼灭之。对日军重要据点则采取优势兵力重点消灭，1941 年 10 月 30 日我胶东地区部队一举攻克回龙山据点之敌，毙伤敌军 190 人，被俘增援日军 100 人，回龙山战斗是东海地区打击日军蚕食的一次著名战斗。狠狠打击日本鬼子的侵略气焰，使全县日军 20 个据点先后被我军收复，最后日军只能龟缩在文登这座孤城，不敢出洞，未等到日本投降就被我军于 1944 年 8 月 30 日攻克。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传到文登县的千家万户时，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不绝于耳，“八年的抗战我们胜利了，受侵略、受压迫、受剥削的黑暗日子一去不复返”。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高呼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决心医治创伤，发展生产，为建设美好家园作贡献。

三、实现中国梦，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不让侵略战争重演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是铭记过去、珍爱和平、共创未来，不是为了加深仇恨，加深隔阂，而是要防止新的战争带来新的仇恨，使我们用无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保持和巩固到永远。如果再有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不仅胜利，还要全胜。如今世界还不太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一帮日本右翼势力叫嚣散步，“什么叫侵略，侵略定义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二战时日本为了中国摆脱西方对亚洲的统治，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来帮助中国解放”。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30 万死难同胞，也

不承认强征慰安妇。安倍晋三说什么“人口贩卖”“人身买卖”。说钓鱼岛是日本固有国土等一派胡言，还说什么“历史认识应该交给历史学家”的主张，不承认二战历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其阁僚每年春秋两次到靖国神社拜鬼，这说明了什么，其侵略野心不死。今年5月5日187名国际知名学者向安倍晋三发出联名公开信，敦促日本政府正视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而后今年5月19日又有一批450多名的全球学者，其中大多为西方学者联名致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敦促他大胆正视日本战争历史，给当代人及后人留下一份诚实纪录。

国际上还有些人淡化中国在二战中东方主战场的作用和影响，二战只承认美国、英国和苏联，没有中国的位置，这是不公道的。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从1931—1945年时达14年之久，孤身奋战打败日军侵略者，时间最长也比所有同盟国抗战时间都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死死拖住日本侵略者，使日军既不能北进，又不能南进。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最多年份投入兵力达197万人，当时日本的国家预算大部分成了军费，而这些钱主要投入中国战场上，使得日本主要战力、兵力、国力消耗殆尽。1942年春盟国将越南、缅甸、泰国也被归于中国战区，10万的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进行了一系列反攻，以牺牲6万人的代价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中国远征军还打通了中印公路这条抗日生命线，为盟军在印度和缅甸战场上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不容淡化的。

历史一再证明：落后就挨打，弱国无外交，国家不强大就会任人宰割受欺负。因此，我们的国家必须强大起来，实现中国梦，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不会走西方那些国家侵略别国的老路，只能同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交朋友，携手共谋发展大计。要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军备能力，让现代武器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必须建设一支素质高、适应海陆空现代化战争打法、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大军队，随时应对入侵之敌。2014年中国立法确定抗战胜利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两个全新的全国纪念日。今年又是中国人民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政府将于9月3日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包括纪念大会、招待会、文艺晚会和阅兵仪式，通过这些活动可以提醒中国人民不要忘记被日本侵略的历史，从而提高公民自豪感，提高全国人民凝聚力，形成钢墙铁壁、众志成城、全民皆兵反抗侵略者的信心和决心。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日本山口大学副校长纈纈厚对中国抗战完美阐释“人是战斗力”。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这比几万架飞机与大炮更有战斗力”。

牛津大学历史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说“日本当时是一个高度军事化，技术先进国家，然而中国这个欠发达贫困国家，殊死抵抗，排除万难，成功拖住了日本，打乱了日本通盘战略部署，让中国不可能战胜的预言不攻自破，中国一直是孤军奋战，独自反抗日本侵略者，中国的持久抗战功不可没，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以及中国在二战中所发挥关键作用，是时候了，应全面完整地重新诠释，要承认中国是战时同盟四大核心国之一，与美英苏三国地位同等，这段历史不仅是被遗忘的中国作为同盟国一员的历史，也是同盟国中受战争影响最大的国家的血泪史”。俄罗斯知名政论家、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说：“是中国撑起二战东方主战场，中国长时间扮演着孤军英雄角色，中国军民克服了千难万险，在敌我相差悬殊的困境中顽强抗战，拖住了日本军的主力部队，使得苏联远东地区、澳大利亚、伊朗及阿拉伯地区诸国免遭侵略，对于这种战略，起到钳住作用，”斯大林说得更为一语中的：“只有当日本侵略者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对德国侵略者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

回顾历史，日本法西斯给中国带来人类历史上空前灾难和洗劫，在那场殊死的战斗中起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的牺牲也是最惨重的。中国的抗日战争长达 14 年，在人力、财力、物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二战期间，中国军队消灭牵制了日本侵略者的大量兵力，发挥了关键作用，不容遗忘，要承认中国是二战同盟四大核心国之一，与美英苏三国地位同等，中国对二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当之无愧。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坚决反对否认、歪曲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图谋和行径，还历史的一个本来面目是时候了。

（作者系农业部原外经中心主任）

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危机初探

孙万鹏

去年 10 月中下旬，笔者等在“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的季节里，启动了赴北欧的挪威之行。从一位好友的亲戚那里，不断地听到了“可持续设计”、“可持续汽车”、“可持续内衣”等等一系列的可持续用语。据了解，这与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特

别重视可持续发展有关⁽¹⁾。然而，返杭后，读到了[美]世界观察研究所撰著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可能吗》⁽²⁾一书，于是，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危机的“推求论究”。

一、九大星球边界面临突破的危机

2009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恢复力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集结的一支地球系统科学精英团体，提出了星球边界的概念。认为科学家们已经识别出了地球系统中重要生物物理过程的九大星球边界，它们共同描绘了可供人类社会“方内安宁”的运作空间。如果这些边界不被打破，就能在“安其所习”的空间内运作。然而，目前的研究表明，已有三项边界已打破“量化的边界设定”，它们是气候变化、全球氮磷循环的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率。

从地球系统气候变化来看，一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容积的百万分数），量化的边界设定为350，工业革命前的数值为280，当前的现状为387；二是辐射强迫的变化（瓦/平方米），量化的边界设定为1，工业革命前的数值为0，现状为15。目前观察到的可能的气候转型现象包括北冰洋夏季海水的减少，世界各地山岳冰川的退化、格陵兰和南极洲西部冰盖质量的损失，以及海洋碳汇能力的减弱。

从全球氮磷循环的变化来看，一是氮循环（与磷循环共同构成一个边界），从大气中移除以供人类使用的氮气量（百万吨/年），量化的边界设定为35，工业革命前的数值为0，现状为121；二是磷循环（与氮循环共同构成一个边界），流入海洋的磷元素量（百万吨/年），量化的边界设定为1，工业革命前的数值为-1，现状已为8.5-9.5。应该说，氮和磷是生命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是肥料中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成分。然而，它们的大面积使用，是须“周知其利害”的，它们也会对森林和景观造成不利影响，甚至“污池渊沼川泽”。如今，“人类从大气中捕获并转化为活化结构的氮，比地球陆地上所有自然过程做到的总和还多。氮边界以每年经工业和农业过程固定，并流入生物圈的氮来衡量，边界值设定为3500万吨，是现在陆地生态系统自然固氮总量的25%”⁽³⁾。在笔者看来，这一边界设定的科学性仍存在疑问，还有待更深入的“探骊得珠”。磷元素也因人类需求而被开采，并通过风化流程进入了生物圈。注入海洋的磷元素被认为是全球海洋缺氧事件（海面下氧气耗竭）的“斩关落锁”的驱动因素。磷边界以因人类活动而流入海洋的磷来衡量，被建议为不超过自然背景速率的十倍。针对磷边界的最新测算，考虑了淡水水体富营养化和流入海中的磷元素两部分，所得的结果是，“目前状况已经打破了全球淡水富营养化的磷边界”⁽⁴⁾。

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率来看，生物绝灭率（绝灭物种数/百万种/年），量化边界设定为 10，工业革命前的数值为 0.1-1，当前的现状已大于 100，研究表明：在生态系统的动态、运作与“维系护持”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生物多样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星球边界的“探幽寻胜”的工作中，物种绝灭率被用来作为衡量多样性丧失的首要指标。当前，物种消失正在加速中，这无疑要削弱各个生态系统在新的环境和生物条件下维持现有功能的能力。从“人类世”到来至今，人类已经在背景速率（即地球历史上典型的绝灭率）的基础上，将物种绝灭率提高了 100 倍至 1000 倍。生物多样性边界被生物学家们设定在每年每百万物种中绝种十种。按此标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边界，至少已被超出两个数量级（约 100 倍）。

还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虽然九大星球边界，明显面临突破危机的仅为三项，尚有全球淡水利用、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全球土地覆盖面积中转化为农地的百分比）等六项，未例作危机对待。但是，化学污染、大气气溶胶含量（区域范围内大气中颗粒物的总浓度）的量化的边界设定，正在“待定”之中外，另外两项：一是海洋酸化，工业革命前的数值为 3.44，现状为 2.90；二是平流层臭氧损耗，工业革命前为 290，现状为 283，但不少专家测算认为，前者边界可设定为 2.75，后者可设定 276，换言之，也都可以认定为处于突破危机之例，或者说亦属“危如累卵”。而且，研究表明：星球边界是相互依存的，打破一项就可能改变或突破其他几项的边界。然而，斯德哥尔摩的精英团队并未考虑这种边界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影响。因此，“言九大星球边界，面临突破的危机”，并非“危言耸听”而故作惊人之语。

二、关于可持续发展危机的治理

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危机，是由两个非线性系统：一个是生物圈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系统，另一个是人类机构、组织和政府系统，碰撞导致的恶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和国内对危机的处理仍缺乏一致性，有些国家甚至漠不关心，这一问题在美国尤为突显。1850 年到 2002 年间，人类活动所引致的碳排放中，28%来自美国”。⁽⁵⁾

从目前看，在可持续发展危机的治理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 Heilbroner）认为，“人类可能不会对那些旨在保护子孙后代的措施予以足够的关注。”他甚至强调说，“他还没有找到证据，能证明个人利益会轻易为公众福利让步。”

社会学家安乐尼·吉登斯（A Giddens）认为，“应该恢复更强的国家干预，但国

家干预只发挥催化和推动作用，确保各项措施能够贯彻实施。”他强调说：“气候危机会促使政府和企业以及民间团体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即更广泛且更友好的伙伴关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大卫·罗思科普夫（D Rothkopf）同样认为，政府应该发挥更大作用，提高政府的创新能力。“建立更有力的国际机构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唯一可能途径”。⁽⁶⁾

一些学者认为，目前不少国家的政府在应对长期危机治理方面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充斥着繁文缛节，效率低下，官僚习气“蓼彼萧斯，零露浓浓”。他们认为，从广义上讲，存在另外三种可行方案：

一是充分利用市场和技术创新。他们强调如果企业能理性对待市场和价格，将会以更快的速度使气候变化的进程稳定下来。2011年卢安武等（A Lovins）在《重燃火源》一书中说：“到2050年，美国能够真正停止使用石油和煤炭吗？这种由商业所引导的、向着高效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巨大转变能保持长久的优势吗？”书中给出了肯定答案，且极具说服力。

二是得益于国家和全球网络的兴起。网络呈分散状，可以自我复制，有时还可自我修正。利用网络来承担传统政府和国际组织之前的工作，其效果更好，效率更高且成本更低。“全球行动网络”，可围绕具体问题，“为下一级群体提供交流平台，或组建更专业的地理和子问题网络”。普林斯顿大学安妮·玛丽·斯劳特（A M Slaughter）的网络设想是：“分散状态下，国家政府工作人员间频繁联系，采取最优措施，就常见问题的协调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由此，就回避了传统的政府间行动和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⁷⁾

三是草根组织推进可持续经济。作家兼企业家保尔·霍肯（P Hawken）认为，草根组织推进了可持续经济、可再生能源、社会正义、透明度以及社区动员等领域的进步，这些在全球不断涌现的组织正在“突破重围”，大任在身重塑整个世界。霍肯描述了数千个团体中，许多与“全球行动网络”有关联。它围绕具体问题，“为下一级群体提供交流平台”。他们动作“迅速敏捷”，吸引了大量的人“参与其中”。较其他公民运动，却很少资金支持。

除了上述的三种可行方案外，加拿大作家兼活动家娜奥米·克莱恩（N Klein）建议，随着政府权力增大，我们可以加强并深化民主措施。专栏作家哈罗德·迈尔森（H Myerson）说：“以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为例，他们赋予我们合众国人民终极权力，

但同时否认人民的这些权力，甚至触及权力的可能。”⁽⁸⁾

三、关于可持续发展危机的民主

古往今来，民主是最优的政府形式，一些哲学家认为，要永续发展民主，而且民主程度越高越好。更高的民主意味着广泛分散权利，鼓励并吸引更多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更直接作用。

然而，很多现代的自由民主国家并不符合上述定义，只是形式上的共和国，大部分权利和决定权掌握在选出的代表手中。在一些共和国中，民主反而“前徒倒戈”。例如，“在美国，最高法院多年来的判决已经确立，那些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政治广告、游说和宣传（2010 年选举花费超过 80 亿美元）的企业或其他私人利益团体，基本上和个人享有同样的公民地位，但并不仅仅是这些民主扭曲现象，迫使人们更好地研究深化民主的益处”。⁽⁹⁾

政治理论家本杰明·巴布尔（B Barber）嘲笑工业世界中民主，“政治像动物园看守”——这些体系设计的目的是“把人们安全地隔离开，而非让他们聚集在一起”。⁽¹⁰⁾事实上，在政治领域，聚集民众的力量会带来大量潜在优势，尤其是对困扰人类的环境危机而言。但自相矛盾的是，自由民主的一个缺点不是让太多公民参与，而是期望参与人数越少越好。

法律学者桑福德·列文森（S Levinson）认为，要首先修复美国宪法中的结构性缺陷，否则改革将无济于世，因为美国宪法中的民主程度低于其 50 个州的宪法。他建议召开公民制宪会议，重塑治理的基本结构和其他方面的瑕疵。

法律学者理查德·拉扎勒斯（R Lazarus）指出，美国宪法和其他法律一样，没有“为联邦环境保护提供清楚、明确的文本基础”。宪法提供“分散、破碎、数量繁杂的法律-----很难全面且整体地处理问题”。

哲学家托马斯·波利（T Berry）强调说：“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活将充斥工业社会毁灭的基础设施，自然世界已经化为废墟。美国宪法并未保护子孙后代”⁽¹¹⁾。他还指出：“我们已经建立人类治理体系，但并未考虑到地球自身的运转规律。事实上，从人类身体到地球文明，我们都属于地球本身，包括人类、生态以及未知的力量”。

托马斯·霍布斯（T Hobbes），还曾描述过这样的噩梦：人类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而对长期危机，民众成为自由主义者，人人能持有枪支，进行混战。重新安置民众，免受海平面上升和沙漠化的影响，处理水、食物和资源减少所引发的冲突，

防止疾病的扩散等，都成了处理危机中的难题。

但是，在笔者看来，应对上述种种危机，强大的民主仍然是最有效的治理方式。但如果没有显著的变革，民主就会产生可持续发展的危机。民主的宿敌，是过去几十年中全球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少数人对于世界的操控。“举例来说，美国最富有的 400 个人的净资产超过底层 1.85 亿人的资产。沃尔玛的 6 个继承人掌管的财富相当于美国最底层 42%人口的财富。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就更为严重。”⁽¹²⁾

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Mumford），在生命接近尾声时总结说，要解决这一难题，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地摆脱”技术统治和企业控制这一“巨大机器”。他们说的摆脱并不是指社区规模的隔离和自给自足，而是更加平等、分散且能自力更生的社区群，能提供大部分的食物、能源、住所、废物循环和经济支持等。芒福德并不建议这种隔离要脱离国家和世界，而是要摆脱对寡头政治力量、技术主导体系以及盲目消费的依赖。可谓“忸妮非壮志，摆脱是良图”。即使在 50 年后，要建立强大的民主国家以应对未来的磨难，他的观点依然是“笔力一新”的最优策略。

我们以欧柏林（Oberlin）为例，它是一个位于美国“铁锈地带”中心的城市，人口近 1 万人，其中 25%处于贫困线以下。它一度是繁荣的工业区，也是政治私利和糟糕经济政策的牺牲品。2009 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欧柏林学院和城市启动了“欧柏林项目”，提出了五项目标：构建可持续经济、积极应对气候问题、恢复繁荣的农场经济且提供城市 70%的食物、在各阶层中宣传可持续发展思想、协助更大范围地在美国开展类似活动。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和各方通力合作，目前实现了“后廉价化石能源”（Postcheap-fossil-fuel）的“坚韧过革焉”的韧性可持续模式。

备注：

（1）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

（2）[美]世界观察研究所著：《可持续发展还有可能吗》，刘利勇、周晚晴等译，谢来辉译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同上，第 27 页

（4）Stephen R.Carpenter and E.M.Bennett, “Reconsideration of the planetary Boundary for phosphoru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vol. 6, no.1 (2011).

（5）The phrase is from James Howard Kunstler, *The Long Emergency* (New York :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5); Kevin A.Baumert, Timothy Hevzog, and Jonathan

pershing, Navigating the Numbers: Greenhouse Gas Data a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2005), P.113.

(6) Anthony Giddens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9), p.96; David Rothkopf, Power, Inc: The Epic Rivalry Between Big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and the Reckoning that Lies Ahea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P.360.

(7) Nicholas A. Christakis and James Fowler, Connected (Boston: Little Brown, 2009), PP.289-292; Steven Johnson, Emergence (New York: Scribners, 2001), PP.224-226;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63.

(8) Harold Myerson, "Foundering Fathers," American Prospect, October 2011, P.16; to improve at least U.S. democracy, See Steven Hill, 10 Steps to Repair American Democracy (Sausalito, CA: PDI Point Press, 2006).

(9) [美]世界观察研究所著:《可持续发展还有可能吗》,第207页,2014

(10) 同上

(11) Thomas Berry, Evening Thoughts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2006), P.95.

(12) [美]世界观察研究所:世界现状2013.

(作者系浙江省农业厅原厅长)

一项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改革

——读《黄奇帆谈重庆城镇化改革》有感

郭书田

近期《财新周刊》刊载了记者贾华杰对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访谈录,甚感欣慰,看到了农村土地改革的希望。他们创造了土地产权价值化的“地票”制度,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承包地、建设用地盘活了,“地票”成为农民参与土地增值分配的工具,能够分享集体建设用地的红利。在城镇化过程中,耕地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有所增加；进城的农民工成为市民的享有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待遇；土地通过交易，农民利益不但未受到侵害，还获得相当大的红利，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从以下一些统计数字可以得到有力的证实。

重庆市是一座特大型城市，是四大直辖市之一，有 1800 万农民，占全市人口的 53%。其中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有 900 万人，400 万在沿海城市打工，500 万在本市城内打工。在四年前相反去外地打工的 500 万，在本市的 400 万，这种现象还在变化之中。他们计划到 2020 年，通过实行“地票”办法，使城镇化率达到 56%，城镇人口增至 2000 万，农村人口下降为 1200 万。

四年来，通过“地票”交易了土地 15.2 万亩，每亩售价为 20 万元，总共卖了 306 亿元。其中 85% 的纯收益归农民，15% 留给集体经济组织。重庆城市土地动迁成本约为 300 万元/亩，而买“地票”的成本为 20 万元/亩，二者加在一起为 320 万元/亩，大大降低了城镇化的成本，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全市 GDP 增长平均 10% 以上，2014 年为 10.9%，在各省市区中名列首位。进出口贸易平均增长 30%~40%，而第一季度为 70%~80%。

重庆产生“地票”的土地来源有三种：一是进城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全市农民每户拥有宅基地平均为 0.7 亩，600 万户约有宅基地 500 万亩。二是乡镇企业关闭后的闲置建设用地以及其他闲置的土地。三是危旧房改造以及建设新农村节约出来的土地。把这三种土地复垦到位经过验收，就可成为“地票”挂牌交易了。不仅改善了危房农民与高山生态移民的居住条件，而且使全市耕地由 3400 万亩增为 3500 万亩，净增 100 万亩。

在本市打工的 400 万农民工中，约有 300 万变为市民，不仅解决了户籍与身份问题，在养老、医疗、住房、就业、子女教育五方面的待遇与城市居民完全相同。

据有关研究部门测算，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的成本全国每人平均为 13.1 万元，其中东部为 17.6 万元，中部为 10.4 万元，西部为 10.6 万元。重庆城镇化的成本，企业负担占 40%，政府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占 30%，农民自负占 30%，为低成本城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重庆在创造与推行“地票”的过程中，把尊重农民的意愿与选择以及维护农民产权利益作为根本指导思想，是顺乎民意而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重大举措，从而使这项改革得以顺利发展。他们以“科斯定理”为参考依据，建立起政府在经济调控与要素指标中产生的价值可以交易的机制，创造性地践行了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在最重要的土地资源配置中，正确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增强了信心。

中央强调，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必须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十分重要。那种使农业副业化、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城镇化，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是伪城镇化，违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城镇化的功能定位中，应当把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融入进去，并作为考核政府政绩的重要依据。

（作者系农业部原政策体改司司长）

学习贯彻“四个全面”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丁玉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和国家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工作的主攻方向，也是推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

一、“四个全面”是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

《人民日报》社论讲：再没有什么使命，比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复兴更光荣；再没有什么事业，比团结十几亿人民圆梦更崇高。“四个全面”是党中央主动的战略选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几次重大会议，构成了“四个全面”形成的路线图：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蕴含了深刻的战略思想，是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全面从严治

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二、新常态下的新亮点

学习《政府工作报告》发现我国经济社会在新常态下呈现不少新亮点：一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0167 元，实际增长 8%，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6.8%和 9.2%，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上的这两个“超过”，带来了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这是多年期盼的结构调整的重大成果。二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及其占 GDP 的比重均超过第二产业。由此带来新增就业人数的较快增长，城镇新增就业 1322 万人，成为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重要原因。三是研发投入强度超过 2%，技术创新成果开始成批涌现。科技创新加快，有力地带动了产业升级。四是《政府工作报告》从中心思想到话语风格，都有一种全盘刷新的意味，达到了困难谈透，信心足够的效果。《报告》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对政府一再限权，“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对人民利益和民间创新则大刀阔斧地放权、让利。对民众来说，法无禁止皆可为；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一个政府，削自己权，断自己臂，大家现在可以理解李克强总理谈及“壮士断腕”的悲壮了。这份悲壮，为的是百姓从改革中分享获得感，值！

三、何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根本要靠发展，发展必须有合理的增长速度。

何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发展中国家成长的规律，经济社会发展到我们这一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2006 年《东亚经济报告》指出：“当一个国家人均 GDP 达到 3000 美元特别是达到 6000 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结构转型、政治体制转化，经济增长出现乏力，人均 GDP 长期甚至几十年徘徊在 6000 美元左右，由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国家和地区依附于西方发展，经济、技术上依赖发达国家，走不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而走出陷阱的国家也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注重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立足于本国国情，走出一条不同于别国的发展道路。

目前，我国 GDP 迈上人均 6000 美元的门槛，人均 GDP 已超过 7000 多美元。由此，摆脱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努力走出一条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新路，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形成经济新常态，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

四、何谓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2014 年 1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世界邮报》创刊号采访时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强调我们要走出一条有自己特点的和平发展之路。

何谓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呢？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即“大国崛起，必遭战争”。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在大国，而现在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回顾人类历史，大国的崛起，无不发生战争。今天，我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正在崛起的大国，这也必然引起人们的担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手抓国防军队建设，努力建设一支能打胜仗的人民军队，一手抓外交工作，树立大国形象，搞好国际关系，履行国际责任，内外兼修，就是要走出一条和平发展新路。

五、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近 10% 的年均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发展的奇迹。陈锡文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指出：“三农”是中国奇迹的强大支撑。他说，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如果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没有谁能救得了我们，更谈不上创造经济奇迹。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两会”答记者问时说，2014 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创历史新高。粮食总产量达到 12142 亿斤；粮食单产创新高，达到 359 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 900 斤。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9892 元，实现了“十一连快”。蔬菜、畜禽、水产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可靠的，抽检合格率超过 96%，

我国农业的成功在于全方位持续推进改革创新。我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农业经营体制入手的，而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是以保障农民经营自主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已在农村普

及。在对农村集体土地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制度创新推动下，到 2014 年，全国已有 26% 的农户全部或部分转让了耕地的经营权，流转的土地经营权面积占全国农户承包耕地总面积的 28.8%。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法、自愿、有偿流转，使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

2014 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55.6%，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已达 61%。农业支持保护体系逐步完善对农业发展发挥了保驾护航作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进程。

据农业部有关部门的文章介绍，“三农”仍是经济的短板。一是当前粮食供应、粮食安全形势很好；二是十一连增实际上是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消耗土地、水等资源环境取得的。中国必须转变生产方式，粮食生产应更多依靠科技，要数量和质量并重。三是粮食生产是有自然规律的，是波动的，不可能一直增产。越到往后，投入越多，增产越少，越不值得。

2013 年，中央提出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就是“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强调“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里的谷物是指小麦、稻米和玉米，口粮是指小麦和稻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中央 1 号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这就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从主要追求产量增长和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尽快转变到数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坚持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全方位改革创新，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必将继续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作者系农业部老干部局原局长）

供销社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打掉官风

卢 文

2015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指出供销合作社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存在与农民合作关系不够紧密，综

合服务实力不强，层级联系比较松散，体制没有理顺等缺点。确定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为：紧紧围绕“三农”工作大局，以密切与农民利益联结为核心，以提升为农服务为根本，按照政事分开、社企分开的方向，因地制宜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快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适应城乡一体化需要、适应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需要的组织体系和服务机制，努力开创中国特色供销合作事业新局面。基本原则是：坚持为农服务根本宗旨；坚持合作经济基本属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这个决定，在新的形势下，将大大推进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和壮大，并将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新的发展。

我国供销合作社开始是在农民入股和政府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既是农民在流通领域的合作经济组织，又执行党和政府委托的任务，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城乡联系、工农联系的主要渠道和纽带。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1958年2月24日，国务院决定，将全国供销合作社和城市服务部合并，称第二商业部，挂第二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作社两个牌子，全国供销社不再设理事会、监事会。6月，又将第一第二商业部合并为商业部。基层供销合作社下放给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领导，成为人民公社的供销部（约一年，基层社又恢复挂供销合作社的招牌）。从此，供销社就实际改变了合作社的性质，变成国有经济，其资产（包括农民入股资金）变成全民财产，不再给入股农民分红；各级负责人由政府委派，和行政干部一样，不再实行民主选举，职工享受国家企业职工待遇；经营按国家计划进行，对国家负责，盈亏由国家兜着。在执行国家委托的购销任务中，在统购派购制度下，常有强行购销、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引起农民的某种不满，于是，农民就不再把它当成自己的组织，这样就完全官化，脱离了农民群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改革，即不断提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问题。1982年中央1号文件中提出：“要恢复和加强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基层供销社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在自愿原则下扩大吸收生产队和农民入股，经营利润按股金和按交售农副产品数量分红，实行民主管理，把供销社的经营活动同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83年1号文件提出：“基层供销合作社应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并扩大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逐步办成供销、加工、贮藏、运输、技术等综合服务中心。”1984年1号文件更进一步指出：“供销社体制改革要深入进行下去，真正办成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这是农民的要求，也是供销社本身发展的需要。须知，群众合作企业的性质恢复得越完全，为农业生产服务、

为农民生活服务的观点树立得越牢固，供销社就会对群众越富于吸引力，就越会在农村商品流通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圆满完成国家委托和农民要求完成的各项任务；否则，就会日益萎缩下去，直至丧失本身独立存在的意义。为此，各级供销社要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关制度也要按合作企业性质进行改革。供销社的体制改革后，经营范围必须适当扩大，经营方式必须更加灵活。……供销社还要积极发展生产、生活服务项目，逐步办成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工商联营，扶持生产，开拓销路，促进多产畅销，使供销社同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成为国家和农民经济联系的纽带。”1985年1号文件又明确：“供销合作社应该完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由群众民主管理。”1986年1号文件继续强调：供销合作社“为适应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彻底成为农民群众的合作商业，国家对各级供销社在财政、税收、信贷、人事制度等方面，都要按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业对待，并给予必要的优惠。供销合作社全国理事会应本着上述原则，尽快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方案。”从此，起到了供销社回到农民群众合作经济组织改革的阀门。

但是，在党政领导层中有一些人认为，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低级形式，由集体上升到全民是方向，将国有企业改回集体是倒退；供销社的资产是由国家投资、贷款和税收等优惠支持发展起来的，是国有资产，社员入股资金很少，不能变成集体财产。在供销社内部，上下都想成为国家干部和职工，不愿退回集体；都想靠国家的财力和行政权力轻松地经营，不想在市场上拼搏，不愿自负盈亏。有一次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对干部讲话，提出：“供销社应回到农民那里去找回自己的亲娘。”不少供销社干部对此很反感，因而遇到很大的阻力，改革在很多地方和很多方面没有获得切实的进展。

十年后，199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并召开了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供销社是农民群众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确认供销社的资产属入股社员集体所有；把供销社从国内贸易部（商业部）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纠正供销社干部、职工思想上的一些重大误区，这才推动供销社改革进一步深入开展，促进了为农服务工作。供销社很多单位执行中央决定，改变了体制和经营机制，扩大了经营范围，增强了实力，得到了发展，密切了和农民的关系，促进了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但是，供销社还有不少单位的干部和职工，没有解决思想问题，总是想留在国

营系统中当官，躺在国家权力身上过日子，靠国家给予垄断地位经营，靠行政权力收购和推销商品，靠国家财政弥补亏空，靠铁饭碗过日子，不愿意真正为农服务，不愿意让农民当家作主，受农民的监督，更不按合作原则给农民分红。因此，农民就把这些供销社看成异类，不予关心帮助。在商品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很多这样的基层供销社竞争不过灵活的私商，有些人希望政府明确规定他们的垄断经营范围，用行政力量确保他们的“流通主渠道”地位，当这种希望不能实现时，有的就埋怨党和政府，放任企业萎缩或垮掉；有的干脆把企业卖掉，或降低条件包给关系户；有的挪用企业资金搞私人的投机经营，赚了归己，赔了让企业负担；有的贪污腐化、大手大脚挥霍浪费集体资财，如此等等，使不少地方的供销社改革成为空话，给当地供销社造成严重的损失。究其根源，就在于官僚思想和作风作祟。

现在发布的《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根据新的形势作出不少具有新内容的决定，如可以实行大田委托、代耕代种，农机服务，发展电子商务，建立中小型银行试点，设立农村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从事乡村旅游、养老、幼教、文化服务等等。此外，如强调为农服务宗旨，坚持合作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各方面的服务，建成农村综合服务中心，推动农村联合体和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和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等等，基本上都是旧话重提。

二三十年过去了，为什么还要重提许多以前讲过的要求呢？就是因为在供销社系统中还有不少人抱着老观念，保持官风，对深化改革不积极，在原地踏步不前。这种状况不改变，供销社的深化改革很难按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开展。

根据过去长期实践的经验，供销合作社的深化改革，不是发一个文件、作一般的号召就能完全贯彻执行的，要全面深入检查，对一些不执行决定的地区和人员，有针对性地认真做好思想、组织、制度、批评、督促等方面的工作，才能使决定落到实处。

第一，要教育供销社的干部职工树立为农服务的观念。一心为“三农”着想，多方为他们谋利益，要以优良的服务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信任，从中汲取力量，更好地发展。凡是只想做官，只图私利，只想凭行政权力经营的人，不适宜在供销社工作。

第二，整个组织需按合作制原则改造，设置理事会、监事会，由其民主选出负

责人，经理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由社员当家作主，让社员享有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一切事情在阳光下运行。负责人不能独断专行，黑箱操作。经营要以服务为主，赢利按股金和社员交售的产品值分红。

第三，要清产核资。查清农民原入股资金和国家投入的资金（国家银行贷款、税收优惠及政策支援不能算作国家投资），赢利应作为原有资金的增殖，明确所有权，享有政治、经济权利，向社员公布。清查改革中资金的流向，查处贪污、化公为私的腐败分子。

第四，按市场规则进行经营，在竞争拼搏中发展。各个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靠优良的服务和灵活经营开创的，国家不能硬性规定。供销社有上下联系、全国网络，有雄厚的资金，有长期经营的历史和经验，有国家的各类优惠，只要真正为农服务，用心经营，赢得农民的拥护，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一些地方供销社在市场竞争中的节节败退，甚至倒台，是由不負責任和官僚作风所造成的。

第五，供销社在执行国家委托任务中，要注意处理好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关系。从总体上说，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有时也出现局部的矛盾。如在棉花收购中，有时国家定价过低，农民不满。遇到类似情况，应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求得解决。在没有解决前，应耐心说服农民照顾国家利益，或采取适当方法缓和矛盾，不宜强制推行，形成与农民的对立。

第六，加强供销社系统的党建工作。供销社的干部大部分是党员，从严治党也包括供销社的党组织。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为农服务宗旨和群众路线教育；加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依法、守法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决定，不能敷衍了事，我行我素。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打掉“老虎”和“苍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已全面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工作，内容具体丰富。只要清除官风，切实贯彻执行，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既有利于新形势下供销社的强大发展，也将促进农业农村的繁荣发展。

（作者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 发展专业合作，建设现代农业 ※

我国“丝路战略”的思考与展望

孙万鹏

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四国时，曾对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章以首义”。访问印尼等国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时，又“诚以吾众为天下倡”，对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年以纪事”。此后，“一带一路”构想不断深化，“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出现了一系列配套的“丝路战略”部署，改变了我国外交的大格局。

一、关于中美“丝路战略”的比较

自“丝绸之路”被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命名开始，对丝路的研究不断扩大充实，涉及了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门学科，受到了中、日、美、德等国学者“重视而操之”，逐渐形成了跨学科、跨领域的“丝路学”研究，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80 年代左右出现两次研究高潮。⁽¹⁾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丝路学”的研究出现了多元化、复合化的发展方向，不仅重新发现、挖掘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资源、经济资源、精神资源和道义资源，更从学理和“躬行实践”两个层面，对“丝路战略”乃至“丝路学”进行“历广漠兮驰骛”地解读。

目前，国外学界对于中国“丝路战略”的研究，仍处于“投袂而起”的阶段，话题更多地聚焦在中国与中亚地区、中东地区等丝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关系、经济往来、能源供给等方面⁽²⁾，其学术成果更多体现为政策性、可行性研究，而在学理分析方面“略显不足”。

2011 年 7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虽然该计划在希拉里卸任前并未得到落实，但在她可能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的背景下，值得对美国的“丝路战略”作一定的预测与解读。

国外学界对美“新丝路计划”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最初仅是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一种可能性进行“思索以通之”，但在希拉里发表讲话后不仅愈发得到国外学界的重视⁽³⁾，也带动了我国学界对美国“丝路战略”的研究。⁽⁴⁾

研究表明，从地理上来说，途经中亚、西亚直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和途经东南亚、西亚“直情径行”至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致构成了我国古代对外交往的版

图，除了极大地带动了当时中国的沿途各国的政治、经济、人文往来之外，还留下了“如入宝山空手回”的大气与美誉。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3 年 9 月，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高度评价了古代丝绸之路，认为“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⁵⁾是古代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新时期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个方面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 10 月，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和东盟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并提出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⁶⁾

应该说，在我国周边战略环境恶化的背景下，通过郑和下西洋这一宝贵的历史资源，激活我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意义重大。可谓是“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而且可以大致形成以美、日、韩和拉美为代表的丝路东线，以东南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和非洲国家代表的丝路南线，以中亚国家、土耳其、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丝路西线，和以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为代表的丝路北线。可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经营四隅，睦乃四邻”。

据了解，美国对丝路的设想，可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萨姆·布朗拜克（S.Brownback）与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Starr）教授，于 1997 年一起提出“丝路法案（silk Road Act）”的立法倡议，1999 年获得批准。⁽⁷⁾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旨在连通南亚与中亚国家，推动以阿富汗为核心、连接南亚与中亚的经济一体化和跨地区贸易，因此，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一直被视作该计划最醒目的“高目标树”与“大本小标”。

然而，虽然中美两国不约而同地从古代丝绸之路上找到调整对外战略的灵感，但实际二者之间“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首先，在空间分布方面，中国“丝路战略”在古代陆、海丝路基础上实行整合与拓展，意在辐射全球；而美国“丝路战略”将范围限定在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部分中亚国家。其次，在涉及领域方面，中国“丝路战略”涵盖了政治、经济、人文、安全四大领域，希望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为时而作，合为事而发”；而美国则以经济领域为“枣核”与首任。其三，在战略意图方面，中美“丝路战略”，除了彼此间的战略牵制与反牵制外，中国“丝路战略”被赋

予了上述更多使命，然而，美国“丝路战略”，至今仍然“一片青模糊”。

二、我国“丝路战略”实现的基础

对我国的“丝路战略”而言，除传统的双边外交外，多边外交包括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全球性或地区性国际组织（也包括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东盟“10+1”等多边机制）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以上合组织为例，古丝绸之路涵盖了上合组织 6 个成员国和 5 个观察员国，而以“弘扬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上海精神”⁽⁸⁾与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⁹⁾一脉相承。对于中国“丝路战略”的发展，上合组织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丝路战略”如上强调的“五通”，也同上合组织目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不谋而合。

其实，从我国“丝路战略”得以推进的现实基础来看，培育“反恐共识”将是一项新的任务。“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受害国之一，然而美国的做法是“辕向南而辙向北”，一方面借反恐之名在中东发动两场战争，使全球反恐局势更为严峻，恐怖主义活动反而加速蔓延；另一方面，美国在某些问题上将恐怖主义与中国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人权问题捆绑，甚至将宗教界的个人与宗教问题相混淆，严重影响了中美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

应当说，亚洲安全问题“八达九房”，极为复杂，既有热点敏感问题，又有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网络、资源”安全的挑战，传统安全威胁与安全系统“交叉”，涌现出了不少“新庙奕奕”的问题，需要我们面对。就全球反恐局势而言，不仅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地区、中东地区呈现了“越反越恐”的特征，部分极端势力已经蔓延至东南亚地区，导致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反恐压力日增。因此，培育“反恐共识”、进行反恐合作，又要将反恐与伊斯兰教问题等相区分，显得十分必要。

习近平在 2014 年 5 月亚信峰会讲话中提出“亚洲安全观”，倡导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呼吁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¹⁰⁾这是我国在安全领域首次提出的“中国设想”。作为亚洲安全合作中最具“共赢”特征的反恐合作，从实践角度而言，无疑会成为中国“丝路战略”在安全领域的突破口。

宗教“走出去”，是中国“丝路战略”的新抓手。“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又不仅仅是文化现象。宗教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把那些分享同一信仰实体的人们联合成一个

教会”。⁽¹¹⁾自丝绸之路出现至今，宗教一直在丝路文明中扮演重要角色。陆上丝路带动了当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传播；明朝永乐年间，郑和船队“下西洋”抵达麦加进行朝觐，并绘制我国第一幅“天房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如何“将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和国家总体外交三者相协调，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且亟需面对的战略问题”⁽¹²⁾。以伊斯兰教为例，中国穆斯林在中阿文明交往中一直起着桥梁与纽带的作用。“1955年至1965年，中国每年都派朝觐团赴沙朝觐。‘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中国于1979年恢复朝觐。”2010年我国穆斯林朝觐人数达1.3万人，且派出波音777大型宽体客机执行直航包机任务，从不断扩大的“雄儿楷式，悍士规模”，都体现了我国对朝觐团的关怀与重视。这对改善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丝路战略”软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也有利于确保中国“丝路战略”的顺利推进。

三、关于我国“丝路战略”的展望

中国“丝路战略”，“朝发轫于苍梧兮”，已有上千年的实践，植根于和平、合作、包容、共赢的丝路精神，致力于“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作用，努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¹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最重要的两个特征，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新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最重要、最成功的公共产品之一，不仅被广泛接受并沿用至今，也对维护国际秩序、世界和平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国的古丝绸之路，不仅对中国对外政策具有重要“启西门而出”的启迪意义，也对世界各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丝绸之路”从贸易之路向合作之路的转变，是一种由具象到抽象的升华。同制度性、机制性公共产品相比，更能体现中国“和合文化”的传统，作为观念性公共产品更符合中国自身的能力与意愿，一旦得到认可，不仅帮助中国建立起一整套话语体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丝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政策的负面联想和无端“朝多猜忌”。

此外，中国的“丝路战略”由政治、经济的双轨，到政治、经济、人文、安全的多轨的发展，还释放出中国积极投身服务全球的信号。以中亚地区为例，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资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比政治、经济问题而言，显得更值得关注。换言之，应将中亚问题放到全球治理的范畴内进行思考，由单一国家提出单一方案很难收获实质性进展。而中国“丝路战略”则强调“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倡共享和平、共同发展，一方面邀请有关各方共同参与治理，另一方面也“尝试其难易”，提出与

中国实力相匹配的“中国方案”，切实履行地区大国和“负责任大国”的义务。

中美两国对“合作大于冲突”观保持一致，而在实际行动中习惯性的互疑与不信任，也是不争的事实，观念与现实“有悖逆反连之行”不断出现，长期以来制约了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2013年6月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元首会晤，此次“庄园外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双方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一致。此种关系经发展完善被概括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是必要前提，相互尊重是基本原则，合作共赢是必由之路。中国“丝路战略”的布局与实施必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纳入考量，从政治互信、经济共赢、人文交流和安全合作四个维度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双边关系。不仅如此，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深远意义，还在于为下一阶段我国整体外交工作提供“借明于鉴以照之”的可复制的成功经验。事实上，在中美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的示范效应下，中英、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先后于2011年10月、2012年2月成立，同时，“人文交流”也被视为中英、中欧关系的“三大支柱”，做到了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后启来者”。这对中国“丝路战略”拓展人文交往渠道、丰富人文交往内涵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总之，中国“丝路战略”的核心展望，一方面在于求和平、促合作、其“见小曰明，宁柔曰强”的柔性本质，将可展望为今后中国对外交往的新亮点与突破口，必定在改善中国国家形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事实上中美“丝路战略”存在“为天下兴利”的重合部分，不论美国“丝路战略”究竟意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加强对中、俄等国的战略牵制，但客观而言，中亚地区多国与中国直接接壤，一个稳定、繁荣的中亚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更为“功疑惟重，身负重任”。因此，理性认识中美“丝路战略”，寻求利益“相契合点”和更大融洽的合辙空间，才能真正在中美“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的新颖框架下，实现“经营两足，气韵双高”的更好发展。

备注：

(1) 沈福伟：“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总序一）”载李进新：《丝绸之路宗教研究》，第3-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2) Muhamad Olimat,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From silk Road to Arab Spring(New York: Routledge, 2013) 等

(3) Washington, D.C: Rethink Institute, 2013

- (4) 邵育群:“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评估”,载《南亚研究》第2期,2014
- (5)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
- (6)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
- (7) Najam Rafique and Fahd Humayun, “Washington and the New silk Road: A New Great Game in Asia?” strategic studies, Vol.31, No.4 (winter 2011), P.4.
- (8) “习近平出席上合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把上合组织打造命运和利益共同体”,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9月14日
- (9)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6日
- (10)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 (11) [美].M.英格著:《宗教的科学研究(上册)》,金泽等译,第2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12) 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九辑,时事出版社,2014
- (13) 王毅:“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在第68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
<http://www.fmprc.gov.cn/mfa-chn/zyxw-602251/t1082324.shtml>.

(作者系浙江省农业厅原厅长)

先进县中的困惑

——江苏昆山市的自我剖析

郭书田

古语“谦受益”和“满招损”成为鞭策人们的重要格言。毛泽东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词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告诫全党在取得胜利和成就的同时,需要保持冷静与清醒的头脑,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不要忘乎所以。最近看到江苏省昆山市农村经济研究会会长张树成写的一篇《昆山市农村改革发展的现状与对策》(载于《苏州农村通讯》2015年第一期),在充分肯定“成就卓著”的同时,

指出“面临困惑”：一是粮食安全堪忧。粮田由改革开放前的 80 万亩减为 10 多万亩，人口由 50 多万增加到 200 多万，人地矛盾与粮经矛盾两难问题突出。二是收入差距拉大。2013 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 21676 元，比平均数低 3874 元，被高收入户拉高了，占 10%的低收入户年不足 3 万元，高低收入之比为 4.03:1。三是生态环境问题。农村生态环境虽有改善，但不平衡，死角较多，重点污染时有发生，水污染依然十分严重。四是农房拆迁问题。有不少农户房屋被拆迁三四年还未得到安置，为拆迁安置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五是民主权益问题。农民集体所有经营性资产财产权、土地经营承包权尚未全面固化，要求呼声很高。这种严格要求自我剖析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赞扬与提倡。

昆山在全国百强县中经济总量位居第一。2011 年 GDP 为 2400 多亿元，人均 15 万元，财政收入 600 多亿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 1.7:1，农业产值占 GDP 总量的 0.8%，90%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城镇化率达 70.5%。2013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25550 元，比上年增长 10.2%，为全国平均数的 2 倍。通过推进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农民户均分红收入 2500 元，财产性收入逐年增加。

但是从反映的五个困惑问题看，在工业化、城镇化持续高速发展过程中，虽然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但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根深蒂固，仍然是很突出的。这种现象在全国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大城市郊区具有普遍性，有些地区更为严重。中央强调“三农”工作是全党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取得很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差距很大。在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人均收入翻番目标，关键在农村。这就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希望中央部署的 33 个有关土地制度改革的试验区，农业部推进的 3 万个现代农业示范区，14 片 600 多个国家级扶贫县，创造出新的经验。

（作者系农业部原政策体改司司长）

※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 ※
※ 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

参观郑各庄村“主动城镇化”发展的印象

丁玉华

农业部离退休干部局东大桥工作处，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由郭书田同志推荐，刘冲处长带队，组织读书组和党务干部 25 人，赴北京昌平区郑各庄村参观调研。读书会副会长金村夫和我应邀参加。上午，在郝玉增主任陪同下参观“郑各庄主动城镇化发展成就展”、老年公寓、基础设施和文化生活设施等。下午，由村委会主任、宏福集团董事长黄福水介绍情况和回答大家的提问，并进行了热烈讨论。我根据参观和介绍，看了赵军洁、黄福水、刘晴写的《农村主动城镇化实践探索》和郭书田同志的《读〈一个村庄的寓言〉的感受》等，写一点心得体会。

一、郑各庄村概况

郑各庄是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个行政村，有 568 户人家，1500 口人，村庄面积 2.9 平方公里。南距天安门 22 公里，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从 1983 年起，黄福水开始担任村领导职务，带领村民开展旧村改造，发展了宏福集团、宏福苑、温都水城，编制村庄发展规划，围绕主动城市化做文章。30 多年来，郑各庄通过土地置换推动产业转型，从“农业村”转向“产业村”，在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向“服务村”升级。目前，郑各庄已经形成了生活居住、教育科研、科技产业、旅游休闲产业四个功能板块，现代城市化社区初步形成。村里自营实体公司由 1 个发展到 35 个；产业工人由 300 多人增至 1.3 万人。建有国际大厦、国际酒店、“养老公寓”、奥运会服务等现代设施，还承接了北京邮电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外迁校址。2013 年宏富集团上交税金 3 亿元，税后利润 4 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 61000 元。正像专家们指出的农民不仅能造田，还能造厂，更能造城。郑各庄已是：一个在农村集体土地上长出的城市；一个实现集体土地经营方式变革创新的乡村城市；一个创造了“郑各庄速度”的城镇化农村；一个走进哈佛大学的典型村庄发展教学案例；一个作为“主动城镇化”案例入选 2015 年国家公务员申论考点预测试题……

二、农村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

目前，对主动城镇化的含义在学术界有不同解读。综合一些学者意见和郑各庄主动城镇化的实践案例，赵军洁等认为：主动城镇化即通过农村环境的改善、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来实现农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

平与城市的接近，其更多的是强调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善，强调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体现农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权益。

被动城镇化主要是直接面临城镇功能和产业辐射的近郊农村，这些农村往往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农民的思想意识相对保守。伴随城镇扩张，农村土地以政府主导的行政征地的方式进入城镇工业和城镇建设的土地市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工业、商业开发。

三、郑各庄“主动城镇化”的变迁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郑各庄村集体经济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全国具有知名度品牌的转变，产业结构实现了从传统单一农业生产到综合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文化旅游业等多元化发展的现代产业的转变，企业形态实现了从以传统经营管理方式为特征的乡镇企业到以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为特征的企业集团的转变，村庄人口结构实现了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传统村落到以非农业人口为主、城乡人口交融的城市型社区的转变，农民生活方式实现了从设施简陋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到设施完善、公共物品丰富充足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社区成员也实现了从传统的农村农民到现代城市市民的的转变。具体表现如下：

（一）村人口结构的变化。1998 年启动的旧村改造和产业园建设，加速了村庄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改革初期的郑各庄，全村 318 户，1158 口人，祖祖辈辈全是以土地为生的本村人。2014 年现住人口 35000 人。其中：村民 1600 人，村办企业和入园企业员工 12000 人，北京邮电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员工 12000 人，员工家属、外来居民、租房户、经商人员 9000 人。

（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变化。37 年前的郑各庄，村集体资产仅有 20 万元，总收入 45.7 万元，人均纯收入 182 元。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1998 年至今，郑各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现有资产 60 亿元，预计 2014 年实现产值 36 亿元，可支配收入 4.5 亿元，创税 3 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可达到或超过 62000 元，实现土地增效、农民增收。

（三）郑各庄产业结构的变化。改革之初的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75%的劳动力从事粮食生产，而改革后的今天，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外出承揽土方工程，到发展现代制造业，再进入城市服务业，已经打造五大产业板块：作为宏福集团起家产业的建筑产业板块；以温都水城为主品牌的旅游产业板块；以宏福创业园

为平台招商引资形成的科技产业板块；以商务会展、影视传媒、文化活动组织及策划等为主的文化创意产业板块；以及以住宅小区、入园企业、大学后勤服务为主的资产运营及保障服务板块。产业结构得到了全面提升，从第一产业为主提升到了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与此同时，村民就业和收入结构也实现了转型，目前村民已经全部脱离农业生产，均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就业，收入结构也由原来单一的农业生产收入变为工资收益、股份收益和福利收益等。

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创造 13000 多个就业岗位，不仅让本村 700 个劳力就业不出村，并且带动 12000 多周边村民及社会人口就业。

四、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村民生活方式和福利保障已发生很大变化。改革初期的郑各庄，仅有一条石子路，饮水取自既不安全又不卫生的水井，公共服务设施很简陋。“取暖靠抖，交通靠走，治安靠狗”，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如今的郑各庄，建立了高标准的基础设施、文化活动设施、优良的教育环境和宜人的休闲场所，生产、居住、教育、休闲等功能区规划严整，景观幽雅，蕴含着现代城市气息，已然成为一个富裕、文明、美丽、宜居的城镇社区。

据黄福水介绍，从 1993 年向村里老人发放第一笔养老生活补贴起，村里福利保障制度逐步实现了三个接轨。一是农民退休年龄、就业人员的“五险”与国家劳动法规定接轨。二是退休养老补贴标准与北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接轨。三是 80 岁以上老人的基本养老金与北京市征地超转人员的月基本养老金标准接轨。

实行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全程教育补贴，水、暖、天然气费用报销，粮油保障，医保以外的医疗费补充报销，农居双重保障，70 岁以上老人免费入住老年公寓等保障制度。

村民的收入由过去单一的劳动报酬，扩展到福利保障、股东收益、土地收益、房屋租金等多元化结构。如 2013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61000 元。其中：劳动报酬 15290 元，村内福利 10748 元，股东收益 21000 元，土地收益 3367 元，房屋租金 10560 元。通过分配制度调节，村民的福利、权益以及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总额的 74.9%，缩小了收入差距，实现了共同富裕，让农民带着资本、带着保障融入城市。

五、中国“村官”走上哈佛课堂，讲述中国农村故事

2012 年 4 月，郑各庄村主动城镇化模式被美国哈佛大学选入教学案例。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福水在哈佛大学作了“创新求变”的主题演讲，并和各国学者

进行了深度交流。

托尼·赛奇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新中心主任，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胡必亮密切合作，他们以郑各庄“自主城镇化”为案例，解剖中国新的城镇化模式，并积极促成黄福水哈佛之行。胡必亮说，“中国企业入选哈佛案例的不少，可是在村庄治理方面，郑各庄还是第一户。”这是中国普通村支书在哈佛讲坛上的第一次亮相。课堂讨论吸引了上百名哈佛学生，远远超出主办方的预料。黄福水的演讲很有吸引力，学生问了很多有趣的问题。

对哈佛学生们关心的“村支部书记产生过程”等问题，黄福水给出了坦诚的回答：“村干部是通过‘两推一选’的方式来选举的，有点像‘海选’。其实和你们总统选举的程序是有类似之处的。”黄福水的话引来了阵阵笑声。

美国学生对中国有一定了解和兴趣，但仍存在有一定误解。“同学们普遍认为中国农民贫穷、素质低，都想从农村出去打工”，当黄福水告诉哈佛学子们“在郑各庄村，村民们不用出去打工，不用到城里去挤公交车，到2015年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万美元”时，他们表示了震惊与赞赏。

黄福水表示，幸福指数实际上是综合指数，既要改善生活环境，也要有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我们努力为每位村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每个家庭都是企业的主人，土地收益是大家共享分配。农民在企业入股，有着人均17万股份，每年不低于15%的回报。”他讲述了一个村庄的城市梦是如何变为现实的。他说：“1990年，我带领村里几十个壮劳力，在北京亚运村做工程时，一位规划专家曾问我，你们农民总是在为城里人建设城市，能不能为自己造城呢？我说，把我们村造成城市这是我的梦想。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果然凭自己的智慧造出了一座城。这座城的规划者、设计者、建设者和拥有者就是我们郑各庄的农民。”黄福水就是这样讲述了郑各庄村“主动城市化”的发展历程。

课堂交流气氛热烈，课后仍有学子追出课堂提问。这场互动对许多中国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场新体验。有的说，哈佛邀请中国基层官员走进课堂是一个崭新的形式，这种互动有助于美国人摆脱当年“张艺谋电影”中的中国基层官员形象。有的说，美国各界都很关注中国的发展，中国基层政府管理等成为美国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中国基层官员走出国门进行直接交流，对中国形象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展示。

问及黄福水此行最大的感受，他用“惊喜”来形容，“哈佛大学就是我十几年前梦想中郑各庄的样子，大学没有围墙，到处都是开放的空间和设施，再过些年，郑

各庄村也会成为这个样子。”

在胡必亮教授看来，郑各庄之所以能入选哈佛案例，是因为成功实现城镇化转型。成功首先体现在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福利改善，民主化程度提高。其次，郑各庄通过产业转型，完成了工业化，进而改变人群聚居方式，代表了城镇化发展的方向。郑各庄的一些创新性探索，实际上是突破了现行的制度和体系，但从长远来看代表了未来制度变迁的方向。黄福水是从一个经济能人成长起来的，但他在很多方面又超过了其局限。他不搞家族式治理，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主动走出去。可以说，他更像一个具备现代市场知识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在他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对于郑各庄的未来，村子的发展受制于大的政策环境，郑各庄仍然面临土地利用制度、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等方面的制约。

最后，在座谈中，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在现阶段中国的大转型时期，郑各庄的发展模式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不能照搬，创新必须与各方面的条件相匹配，如整体环境，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特别是土地资源问题。郭书田同志在文章中提出四条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城镇化无疑是要占用土地的，尤其是城市郊区的土地更为珍贵。郑各庄原有 4000 多亩土地中留下农用土地只有 70 多亩，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需要研究的。我们在参观中见到，在最早支持郑各庄改革发展的是“农业部乡镇企局”的授牌。黄福水对农业部老干部前来参观特别热情，亲自接见和介绍情况。尤其是他表示宏福集团的接班人不搞家族化，也不作集团的控股大户等，大家都很赞赏。

（作者系农业部离退休干部读书会会长）

弘扬“内圣外王”之道

——从朴槿惠总统感受中华民族经典的力量说起

卢继传

提要：理解内圣外王的内涵，要了解如何做人，人的最高成就是什么？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或传统文化的中心问题。今天，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人都可以从内圣外王得到深刻启示。

（一）

2013年6月，当今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期间，应邀在清华大学演讲，她动情地说，她年轻时父母先后被刺杀后，从权力顶峰的总统女儿一夜间沦为平民和天涯弃儿。18年痛苦隐居，在“比死亡还痛苦的艰苦岁月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帮助她重新找回“生命的灯塔”。

她对听课人说，中国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使她认识到，当政者进行内在精神修炼的重要性。为此，她闭门学习中国文化，《论语》、《贞观政要》、《明心宝鉴》等中国文化经典成为案头常备书，修身养性。她的演讲令国人振叹，报以热烈掌声！

《论语》记录了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其总的精神就是“正心修身”，是成就人生的指南。

该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古典，并称《四书五经》，均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思想、智慧宝库。

《贞观政要》是唐代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吴兢（公元670年—749年）所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内容包括大臣的诤议、劝谏、奏议等，该书旨在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理军政的思想。

《明心宝鉴》约于元末明初成书，内容荟萃明代之前中国有关贤圣的品德修养、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论述。此书是中国历史上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古籍，被译为西班牙文等。六百多年来，它一直风行于韩国、日本、越南等国，被用于青少年的启蒙教育、道德教育的重要读物和个人修身立志的经典。在韩国，它是李氏朝鲜王朝宫廷的一位女医生“大长今”最早的启蒙读本。“大长今”在培训各地官衙的女医生时，学习的经典课开篇即是《明心宝鉴》。

在中华民族经典的思想体系中，德操是做人的基本素质，更是统治者执政必备的重要品质。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其精辟地指出，治理国家必须实行德政。道德的教化，就像北极星在它自己星座上，漫天星辰都拱卫环绕着它运行在寥远的天际。朱子则一言以蔽之：“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为政在德，做人同样在于德行，只有德行永垂。德之所以立，在于“思无邪”，只有思想纯正，才可能高尚行动。这些伟大思想正是此时朴槿惠视为一剂灵丹妙药，感化了她，使其“毛顿开”，从消沉中振奋起来，

勇敢地面对现实，遵循“内圣外王”操行，满怀激情投入新的生活，荡泻去心中杂念，不懈地为实现未来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朴槿惠以中华民族经典疗伤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作为人类文化和思想精华的中华民族经典，世人阅读起来是有难度的。但她18年如一日，静下心来，不仅把中国古书读懂，而且从中感悟，遵其修身养性复出，使她内心强大，境界提升。她以为韩国人民忠诚服务的鲜明旗帜，参与竞选，而征服人心，最终成为韩国第一位女总统。

朴槿惠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国文化的成功，鲜活地向世人实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力量和巨大影响力。

(二)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叙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并深刻地解释了怎样能够得道，从而怎样得以做到内圣外王？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或传统文化的中心问题。

理解内圣外王的内涵，要先了解这个中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做人，人最高的成就是什么？

人有各式各样的。每一种人都可能取得最高的成就。有的人从政，在这个领域里，被认为最高成就便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样，在艺术领域里，被认为最高成就便是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诸如情况等。

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成为某一个领域的“家”，不能代表做人的最高成就。因为，人可能被分为不同等级或层次，但他们都是人。这可做这样的体会，从政或做事，首要的是做人。做人在于厚积德义，在于修养自己的人品。换言之，做人最高成就是指高尚人格、修身养性，完美心灵。

那么，以中国传统哲学之言，就做人来说，最高成就的标杆是什么？就是成“圣”，而成圣的最高成就则是，个人和宇宙合而为一，即天人合一。这可称之为“圣人”。

怎样成为一个圣人？需要理解并超越“入世”与“出世”的哲学观念。

多数哲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关切眼下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它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以及人的今生，而不关心它的来生。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入世的哲学”。

有的哲学家则认为，一个圣人要取得最高成就，必须追求天人合一，关注宇宙，

超越道德价值，抛弃社会，甚至抛弃生命。这种观点通常称为“出世的哲学”。

这里提到“宇宙”概念，“生命”等概念，古人是怎样解释的，我们做如何理解？

“宇宙”概念是指一切存在的整体，相当于古代哲学家给它的定义，是“至大无外”，用通俗的话说，这个整体是无边界的。因此，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在宇宙整体之中。作为人其心胸要广大，爱要有跨度，而不只是你生活之中的社会，更不要局限于在个人的小圈里，碌碌无为了此一生。

以伦理道德更高的价值称之为超越道德的价值。例如，爱人是一个道德价值，爱神是一个超越道德的价值。何谓神？古代哲学家认为，神的含义是宇宙世界或社会民众，爱神即指爱大家。

人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而追求超越现实世界，这是人类深处的一种渴望。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指对客观事物信息的了解，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加以体验而高于道德的价值。

老子在《道德经》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就是增长正面知识，道则是心灵的提高。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是后一个问题。这可做如下理解，阅读不仅促进学识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锤炼修养，使人站高望远，扩展人的视野，提升自己的品性。

关于“生命”概念，中国传统哲学视之为反思的产物，认为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其一讲，人只要还没有死，他就还是在人生之中；其二讲，道家教导人顺乎自然。庄子认为，万物有生必有死，人对于死，顺应自然；其三讲，人生是苦难的根源。有的道家认为，生命是赘疾，是个瘤，死亡就是除掉那个瘤。

这些看法都主张人应该从被“物质败坏”的世界中解脱出来，所谓生命有涯而精神不死。中国传统文化正以此意说明，一个圣人要想取得最高成就，必须追求天人合一，抛弃社会，甚至抛弃生命。

中国传统哲学明确提出，入世和出世是对立的。站在“入世”哲学的立场看，出世的哲学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因而是消极的；站在“出世”哲学的立场看，入世哲学过于实际，也因而过于肤浅。它诚然是积极的，但有太多的欲望左右自己，它是像一个走错了路的人，走得越快，在歧途上就走得越远。

中国传统哲学使命正是要在这两级对立中寻求其综合。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能够实现“入世”和“出世”的哲学综合，就是“圣人”。换言之，他既入

世，又出世，就是中国圣人。这个做人的最高成就如同佛教中的“佛”和西方宗教中的“圣徒”。

中国的圣人独善其身，有其内涵品格，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圣，指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修养；外王，指他在社会活动或为民办事中好似君王。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圣人或圣贤应具有内圣外王的品格，哲学的使命是倡导人得以发展这样的品格。其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道是指道路或基本原则或基本原理。

对此，中国传统文化阐述以下要点：

1、“内圣外王”是指政治领袖应当具有高尚的心灵，至于具有这样的心灵的人是否成为政治领袖，那是无关紧要的。至此，可以认为，古人所说的圣人，不是君王或天子（古代对高层官员的称呼），而是圣贤人士、思想家。

中国传统哲学主张，一个圣人是道德完美的人。正如孟子所说的：“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但它必须经过长期修炼，使他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事物中能够坚持永恒的理念世界。对此，孔子有言：“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这是说，君子纯正坚定，不能轻率地违背正义。

2、儒家强调，圣人要在处理世俗事务之中陶冶性情，培养自己成为圣人的品格。对此，他要把处世为人看作不仅是对国民的一种应尽的职责。而且如孟子所说的，把它看作是为“天民”的应尽的职责。圣贤人士视民为天，民意即天意。敬天，就要敬畏人民。人而成为“天民”，要有诚意地、自觉地去做，这不仅是事人，也是事天。所谓不事功利，方可成就极致。

3、内圣外王之道，研究的不仅仅为了寻求这种哲学的知识，而且要培养这样的品德，要求信奉它的人以生命去实践这种哲学。哲学家（或圣人）应终身持久不懈地操练自己，在生活体验之中，超越了自私和自我中心，以求天人合一。这种心灵的操练一刻也不能停止，因为一旦停止，自我就会抬头，内心的宇宙意识就会丧失。

（三）

根据以上中国传统文化阐明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三点基本思想原则，归纳如下：

其一、内圣外王之道是知行一致的哲学思想，知行是不可分割的。

正如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所指出的：“从认识角度说，哲学家永远处于追求之中，从实践角度说，他永远在行动或将要行动。”“哲学不是仅供人们去认识的一套思想

模式，而是哲学家自己据以行动的内在规范”。这里所说的哲学是指内圣外王之道，哲学家是泛指圣贤人士，或圣人。

其二、内圣，是一个人心灵有高尚的精神境界。这是通过长期不懈的修炼达到的。

自身修养、道德修为向来为圣贤人士所看重与践行。古人重视修身，有涵养，明事理，识大局。

孔子认为，君子德行修炼，以仁德为准绳。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孔子这句话含义深刻，仁是一种境界，是道德的极致，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是君子之德的第一要义。他这样说，一个人在心里真正建立了仁爱的精神，也就能够宽厚地对待任何人了，也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看不惯的人和事了。对此，朱子则指出：“其心诚在于仁，则必无为恶之事矣。”这就是说，诚有为善之仁心，仁德的修养，应当放弃爱与憎的偏执之念，杜绝有损于德行修养的欲求与私心。

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乃是今天被人信奉的人生座右铭。此名言指大智若愚，即不在眼前的物质利益上斤斤计较，而能明达事理、忠厚待人，不做小人之辈。小人在小事上机关算尽，却往往在功德法治上犯错，使自己陷入泥坑。

修身提升涵养，使人们人格健全，成为文明人、文化人，远离野蛮、愚昧。

其三、外王，是指圣贤人士要有君王之风范。

即以内圣为行动指南，始终以内圣规范自己的行为准则。圣人在社会活动或为民办事之中，要视为民是一种天事，以天下为己任，诚心诚意为民尽心尽责，为民造福，所谓“仁之所至，义所当然”。

宋神宗二年，儒家张载出任崇文院“校书”，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希望获得他的支持。对此，他提出治国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经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所说的是要敢于担当，立志远大，为民为国肩负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推动社会发展。这四句话为后世君子或圣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

孔子说了一句名言：“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坦诚是君子的灵魂、虚伪是道德的大敌。诚信做人，重道而行，光明磊落，就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任；小人言而无信，表里不一，心里藏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必然焦虑不安，或者戴着面具生活，这种两面人是得不到尊敬的。孔子还直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其指当权者，意为当权者能以身作则，

行为端正，即使不发号施令，也能贯彻下去；当权者自己行为不正，即使三令五申也不会有人听从。

综上所述，内圣外王之道，成就了朴槿惠成功地荣任韩国总统，它更可称之为圣人之道或君子之道，也可称为官德文化，作为任何国人修身操练之道。今天，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人都可以从内圣外王之道中得到深刻启示：

人生每一步的成功，都从做人开始。我们要学会修身养性，锤炼自己的涵养，提升道德价值观，做一个新时代的圣贤之人。

注：本文所涉及论据、概念、命题、讨论均引自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著名中国科普作家、知识经济学家等）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各省农委（农业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卢继传

副 主 编：许小平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5015/5016/5293

010-57168089 57206299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农业部北办公区16号楼、18号楼）

主 编：胡兆荣

责任编辑：裴红蕾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xxp1102@163.com

